



源於真蓮

李漢源

說好香港故事

主辦大型綜合體育賽事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全球化、多元化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當然也成為了最有效的國際交流平台，因此很多國家地區都不遺餘力去發展這方面的硬件及軟件。

在香港，我們上次也提及過，啟德體育園的落成，使我們在硬件方面更有能力去舉辦大型體育賽事，不過如何在軟件方面令啟德體育園不要淪為大白象，就要長遠計劃如何利用體育園辦更多體育活動，這當然要體育業界配合。辦大型體育賽事，有短期效應，也有長期效應，對該地區及城市發展有促進及帶動作用。

近年，中國不斷舉辦各類大型體育賽事，包括了2次奧運會、3屆亞運會、3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亞洲盃，以及大大小小體育國際賽等，無疑想從主辦國際性體育活動方面「講好中國故事」，而我們也想「講好香港故事」。

今年杭州亞運會，大會估計亞運期間到訪杭州人士會達到2,000萬人

次，雖然大部分是各省市來的遊客，但對杭州認知及旅遊收入有莫大的裨益。筆者上星期參與香港太極國際學院舉辦的湖北武當山兩地中學生太極推手大賽，中學生運動員大約20位，但參與家長等整團達60多人，6日行程除了一天比賽外，其餘日子就是參觀武漢科技、汽車城、藝術歌劇表演及旅遊黃鶴樓、博物館等，讓一班旅遊學生更了解武漢市疫情後現況，由此可見，主辦是次活動的武漢市也是藉着體育去講好武漢故事。

單一國際體育項目，羽毛球、乒乓球、七年檯球等國際性賽事時有舉行，而今年12月15日巴黎奧運霹靂舞比賽也會在香港舉行，但國際性綜合運動會香港則未有主辦過，只在2009年曾主辦過地區性東亞運動會。其實能定義為國際性運動會的並不多，只有奧運會、青年奧運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界運動會(The World Games)等等，屈指可數。最近在四川成都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大運)就是一個城市舉辦國際性綜合運動會的成功例子，香港又可否借鏡去參考主辦呢？世大運會有來自世界約150個國家及地區大約10,000名運動員參加，年齡為17至28歲，這班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生運動員在運動水準和學術造詣上全面均衡，在教育、文化及體育結合下，絕對可以講好香港故事。

期望啟德體育園的落成，能使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有一個香港主辦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吧！



方寸不亂

方芳

相遇那幾年

香港《文匯報》75周年報慶之際，副刊《采風》版多位同文的祝賀文章，勾起了不少回憶，其中的人和事，有相遇的軌跡，也有擦肩的相望。

鄧達智談及副刊的《百花周刊》，是文匯副刊不可忘卻的一部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百花」，是少有能進入內地的潮流生活雜誌，內容百花紛呈，任達華、鄭文雅、張瑪莉的攝影，李樂詩的南極足跡，鄧達智的時裝設計，梁冬陽醫生的保健指導……很是吸睛。正因為「百花」風行全國，據當年發行人員說，報紙一到內地，發行商先抽起「百花」另外發售。本人在「百花」的欄目，收過新疆讀者的來信，更有上海讀者來港探望；鄧達智作為香港時裝設計師，「百花」為他開拓了更廣闊的天地。

「以文會友，海匯百川」，《百花周刊》擴大旗舉行過多場讀者活動，建立起「百花之友」讀者群，得到社會各界朋友的支持，電台著名DJ和藝人，都有為「百花之友」主持活動。《文匯報》在八九十年代，凝聚了大批社會朋友，「百花」有份建功。

不同時期的副刊有不一樣的特色，九十年代的文匯副刊，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呢？專欄作者陣容，香港政商文人雲集，吳康民、朱連芬、王敏剛、蔣麗芸、陳毓祥、梁振英則更早些；國學大師南懷瑾一度登場，名筆有鄧偉雄、翁靈文、韋基舜、莫天賜、梁家輝、李純恩、葉濼馨、陳復生、陳任、黃雅歷、李默、查小欣、李韓玲等等……他們的文字細膩，翻若驚鴻，腹有詩書，虛懷若谷。

翻出一張《文匯報》50周年慶的老照片，蕭芳芳、羅文、任達華都是《文匯報》的老朋友，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一見恩25年過去，昔日老朋友，既有依然安好，也有故人遠去。如今75載的《文匯報》，寶刀不老，新朋友更多，明天會更好。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文匯報》一份有溫度的報紙

時光荏苒，欣聞香港《文匯報》75周歲啦！作為長期的專欄作者，我感覺《文匯報》在對外，是傳達國家聲音的報紙，發揮愛國愛港的影響力，散播出香港社會的正能量。在對內，同事之間，像是親如一家人一樣。在我認識的、從內地來香港的文化人之中，有六成以上的朋友都曾經在香港《文匯報》工作過，他們積累了相當的工作經驗和人脈關係後，再轉戰其他的香港各行各業或媒體；一些朋友離開《文匯報》後，都可在相關的界別嶄露頭角，叱吒風雲，成為香港有影響力的學者或媒體人。

我感覺《文匯報》是文化人在香港的另一個老家；例如，我認識的其中一位朋友，初來香港在《文匯報》工作，由於人生地不熟，他的上司陪他去百貨公司買衣物及日常用品，甚至給他出主意，到哪一區買甚麼菜較好，逢年過節的，上司會邀請下屬一起吃頓飯，遇上屬情緒低落的時候，他的上司就像大姐一樣，愛心又耐心地開導他。在3年多疫情期間，這位朋友離開了《文匯報》，也離開了香港，但當他回來香港，約見當年的上司姐姐時，由於沒有「安心出行」，不能走進餐廳，上司姐姐買了兩盒飯，坐在尖沙咀海旁的長凳上，一邊吃飯一邊互聊近況。

有位老耄之年的老朋友既不懂電腦打字，也不會手寫板，但他有一個夢想，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成為專欄作家，我想成全他的夢想，遂將他介紹給副刊編輯主任，並告知，他只會用手寫稿，傳真到報館；沒料到，編輯主任立即答應邀稿，並說：「手寫稿很珍貴，傳真過來呀，我們幫忙打字。」

我可以想見，這位老耄老人的手寫稿是多麼潦草難辨，真是難為了副刊編輯的小姐姐，《文匯報》真是一份有溫度的報紙。

《文匯報》在1948年9月9日創刊，是由南來香港的上海《文匯報》人與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在香港創辦的一份報紙。上海《文匯報》原創刊於1938年，從這個年份來看，即是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辦的報紙，主要是宣傳全國同胞抗日，抗戰勝利後，1947年5月24日停刊。而適時由當時國民黨的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創建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在籌辦機關報，此時原上海《文匯報》人也籌劃在香港復刊，於是經過雙方商議，把創辦機關報的念頭與《文匯報》復刊的計劃結合起來，就誕生了香港《文匯報》。

根據李濟深的孫女李露君回憶說：「當年爺爺把廣西桂林的老宅變賣了10,000大洋，用來支持《文匯報》在香港創刊。」身為北京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的李露君說：「爺爺沒有留下半毛錢的遺產給我們，爺爺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

作為一名長期在《文匯報》發表作品的專欄作者，我深深地了解，這張以愛國愛港為宗旨的報紙，不以賺錢為目的，主要以匡正社會風氣為主。

《文匯報》辦報理念是「文以載道、匯則興邦」，指文章是弘揚真理，闡明正道的；匯則興邦，寓意匯聚團結上下一條心則國家興盛。我是這麼理解的。

期盼《文匯報》100周年報慶時，我仍然是專欄作者。



翠袖乾坤

連慧慧

從認識那個「匯」字開始

記得大約是小學二年級那年吧，父親買了新屋，我們搬家，看到父親搬動好幾大疊舊報紙時，感到有點奇怪，尤其是當他謹慎處理幾本齊整心愛的剪報集子，不明白那些舊報紙有什麼珍貴，其中一本封面貼着香港《文匯報》報頭筆畫緊密的「匯」字，像厚切蛋糕一樣攝入眼簾，真是太有趣了，從未看過這樣的字，便問父親這個是什麼字，父親告訴我之後，隨即打開剪報集子，翻出其中一頁漫畫對我說「這個你也可以看呀！」

母親說父親年輕時就喜歡剪報，不論是國際新聞、散文小說、歷史人物掌故，只要他感到有趣的就剪下來，《文匯報》的漫畫和遊戲版，也在保存之內，可惜第二次搬家後，雜物太多，不少剪報流失，只有其中小部分經我過目的，才另外剪存下來。

自從打開過剪報集子之後，我不知不覺也傳承了父親的興趣了，報章也是每天都忘不了的主要精神食糧，同時亦不自覺跟父親一樣養成剪報的習慣，日後入讀新聞系，還順理成章做過幾年新聞工作者。

回憶最初翻看父親剪存舊日的香港《文匯報》副刊，感覺真像

個新天地，內容可說海闊天空，漫畫版除了針砭時弊生活趣味惹笑題材之外，也有抒情作品，當中還有畫畫，最意外的是，文藝版偶然還有作者撰寫時事粵曲，父親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番香仔」瘋狂迷戀歐西流行曲的時代，年輕人對粵曲粵劇興趣不大，從來沒有其他報紙會登粵曲。可是《文匯報》副刊只重作品內容，包羅任何形式的創作，刊登粵曲，可算一項大膽突破。

有個老讀者說香港《文匯報》副刊一直以來仍保持她廣納四海的特色，就是同版內南腔北調作者並存，從不同語言風格文章中品嚐不同作者的生活方式，從用詞異同的融合，感染到那種南北和的興味，也是無形的奇趣，廣東話普通話打成一片，溝通不再存在障礙，豐富了語言世界，可說是文字帶出生活的一大樂事。



◆匯字密度味道濃郁。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梅冬

隔壁院子裏的陽光不錯。黃果蘭正抽出新芽，有淡淡的香味悄然越過牆頭沁入心脾；一棵枇杷樹已經掛果，點綴着清和未暑的光陰；圍牆外高大的小葉榕探進院子來，新芽如豆莢，楚楚動人。顯然，老頭打理過院子。陽光從西邊照過來，斑駁地投射在老太太身前後、腳邊、衣襟上，透着一朵朵的光亮，像盛開的白色曼陀羅花，又像是時光的腳步，在慢慢地挪移。

想在這樣短暫的時光裏，感受一點美好——一段音樂，一首詩歌，或者一撇一捺，或者一場愉快的聊天。

煮一壺咖啡吧。隔着一道圍牆，煮一壺香濃的咖啡，將無聲的溫暖氣息傳遞給那邊窗中的老太太，和靜默陪伴的老頭。

一壺香濃的時光是需要一冊好書的。每每這樣的時刻，我會想起張愛玲和她的散文。張愛玲的散文有一種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存在，她的語言超越了她的女性性別，用一句過分點的話說，她的語言有時候是刻薄的。她在《更衣記》裏寫道：「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像個女人而像一縷詩魂。長襖的直線延至膝蓋為止，下面虛飄飄垂下兩條窄窄的褲管，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在中國詩裏，『可憐』是『可愛』的代名詞。」說是刻薄吧，又十分準確，除此，再也沒有比這更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舊時女子的穿戴形象。尤其是「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句，讀之，三寸金蓮的那種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可憐」就似乎近在眼前。《談音樂》中，她寫着「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第一次讀到這個句子，我拿

一壺時光正香濃

鋼筆在下方狠狠地畫了一道橫線，彷彿要在這文字下面畫出一道地平線來。張愛玲語言的力道則比我狠狠畫出的橫線更深。

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能坐下來，煮一壺茶，或者一壺咖啡，不是常態，所以這種難得的閒適尤顯珍貴。只有這種時候，才能從那些宏大的氣象裏抽離出來，可捫心，可神遊古今。現實中，難得一個「閒」字。「閒」，是門口有月，這意思是心賞月，有心看到天地之大美，才是閒。這種美無所不在，可是，我們有多久沒有注意到天上月亮的變化了？

說到「閒」，會想到蘇舜欽滄浪亭的對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遙山皆有情」；也會想起蘇東坡《赤壁賦》裏的清風明月。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閒下來，才能看到美，才能看到路邊的樹葉綠了，黃了；小草枯了，發芽了；看到孩子的笑臉，看到日月的光華。大裏有小，小裏有大，人群眾一次溫暖的伸手相扶，一片葉芽裏吐露出的春天……那麼多的美，在等着我們去發現和看見，這種發現和看見，不是向外，而是向內的。

有一種油桐，它們的雄花會在某一時刻集體飄零，留下營養給雌花，最後結成油桐子以繁衍後代，它們以群體犧牲的方式來成就生命之美，是一種悲壯的義舉。都說草木無情，但面對油桐之花，又分明感覺到一種有意識的感知和溫暖的感情。到底草木是不是無情的，不知道，人類目前沒有研究到這一步。人類可能永遠也不懂草木，然而四季輪迴，我們總能受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給予的感動。

隔壁老太太生病以後，再沒有聽到老頭的呵斥聲。早起、買菜、做飯、推輪椅……如果不是出門遇見，我會以為他倆還住在兒子家。此刻，在院子裏曬着太陽

喝着茶的老頭老太太，桌上一個暖水壺，老頭身前有個茶杯，老太太這邊沒有杯子，或許老太太是不喝茶的，她穿着厚厚的黑紅色相接的毛絨大衣，戴着紅色毛帽，斜靠在塑膠躺椅裏。老頭挺着腰，直直地坐着，都不說話。老夫老妻，大約也不需要說什麼，就像顧城詩歌《門前》裏寫的那樣，「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着，不說話/就十分美好」。這種狀態，不就是我們常常幻想的愛情樣子麼？

世間萬物，都不過是一次生命的歷程。在這個過程中，感受美是第一位的，就像李澤厚創作的文藝理論著作《美的歷程》的書名一樣。人來這世間一趟，就像一朵花，無論怎樣不起眼，它都努力地開放，然後安然謝幕。龔自珍寫「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花朵凋落，落地成泥，去滋養下一個生命，這是一場關於生命的感動。人類繁衍，何嘗不是如此？花謝花飛，也是完成生命的一段過程。原來唱《葬花吟》，「花謝花飛滿天紅，紅消香斷有誰憐」，會禁不住地感傷，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以後，覺得「謝」是很善意的。今年2月早春時候，我站在一棵梅樹下，看着眼前一片又一片的花瓣從樹上飄落下來，覺得好美。它們的顏色、姿態，和落地以後從容的躺姿，都美得無以言表。之前，我一直覺得花開的過程是有痛感的，但看到落花，就覺得它們，是的，它們，是幸福的。完成了一次生命的過程，從容地謝幕，它們了無遺憾。

「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時光裏，溫一壺咖啡，掃院中落葉，曬一曬棉被，讀一段文字，吟一句詩詞……有咖啡佐閒，倒也並不違和。接納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對自己生命的綻放，便是對莊子「天地有大美」的最好註腳。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處世哲學

我早過了看動畫的年齡，但衝着數十首唐詩，還是第一時間買票進了戲院。常聽年輕朋友說內地近年的動畫片很好看，以為只是給孩子們看的片種。但看了正上映的《長安三萬里》，才發現，原來動畫片已進化如劇情片般吸引成年人。

廣受傳誦的唐詩自然是賣點，影片中出現的名人雅士因感情節影射唐詩，不但令對白增添文學美感和富於意境，對觀眾而言，很多詩句皆膾炙人口，自然有親切感。據說，電影成為話題後，也惹來不符史實的批評，曾作為唐朝陪都的洛陽人甚感不滿，洛陽史學學會作為代表，還鄭重地發表聲明，具體地指出失實之處，要求編導道歉。作為歷史研究者，加上居住地情緣結，這麼受注目的史詩式電影居然提都沒提洛陽，難免有被忽視或被消失的感覺。

但是，電影是藝術品，也是商品，是創作或製造的產物，歷史或史實只是待加工的零碎原材料，需要技巧去組合，去琢磨，去補充，砍去分散注意力的雜枝，才能令故事主線更集中，層層緊扣而令人追看下去。歷史題材的動畫與真實的歷史不能相提並論、等而視之，動畫的虛擬、誇張、玄幻乃至臉譜化，正好活化冗贅的史料，令其趣味化而吸引人。

千年唐詩之所以自成一派流傳，自有其超越時空的理由。青少年讀唐詩，除了打好語文基礎外，還有追求

古詩押韻的音樂美，在這一點，電影充分體現。靈機一動的詩興往往是歷在心头、醞釀多時的思緒，只是酒精催化或情緒刺激而迸發成篇。語文老師向學生講解，往往要兼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詩人處境，才能令學生明白那些精簡雋永的文字含意。這在有情節、有畫面、有動作的立體電影中，效果好多了。

我在電影中看到的不僅僅是詩情畫意、浮華盛世，而是兩個性格迥異的男人那種肝胆相照的友情，以及當中表現出來的處世哲學。大千世界紛繁複雜，個人很渺小，難以獨善其身。兩位主角的人設，性格和處事風格形成對比。

或許動畫形式不利於表現微妙的表情和內心變化，李白的張揚和高適的木訥都有些誇張。但在武戲上卻派上用場，比如李白在臨河的欄柵上吟詩，王維在橫樑上彈琴，以及後段眾人乘鯤鵬而去，這些瘋狂之舉就有眾俠片元素和動畫片優勢。這也是電影另一個吸引人的元素，動靜相宜，才不至於悶場。

這是寫實劇情片做不到的。這正是編導的聰明之處。出世和入世都是相對的，生活中，浪漫和踏實正好互補。現實的壓抑需要浪漫來活化，激情澎湃的詩不僅僅是抒情，也刺激想像和創意。

所以，本片的唐詩很突出，但真正啟迪人心的，卻是透過一對詩人的友情呈現世情，以及處世之道。



琴台客聚

伍采聚

2013年是我開始職業寫作的第三個年頭。

這一年，我的師父——作家、學者胡野秋先生因同時在報刊和雜誌開了幾個專欄，一時忙不過來，便推薦我接替他在香港《文匯報》副刊《琴台客聚》的欄目。

猶記得當時，對欄目十分負責的主編並不大信任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卒子，出人意料地在當期專欄做版前幾小時要求我重寫一篇文章發稿，如此一來，倒讓我通過了主編的考驗，亦讓我對香港《文匯報》更多了一重喜愛與敬畏；從他們對作者的嚴謹要求，便可知「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辦報宗旨並不是一句空話。

我自小愛讀書，雖然自小讀的書都是簡體漢字，但我卻十分喜歡繁體字，年少時與同齡人一般在筆記本上抄錄一些港台歌曲的歌詞時，是一定要寫繁體字的；到後來開始寫作，亦是學金庸先生，將我本名中的「梅」字拆開來做了筆名。

其實在給香港《文匯報》寫專欄之前，我已曾在《羊城晚報》、《深圳晚報》、《深圳特區報》、《華商報》等報刊陸續地寫過一些專欄文章，然而最令我歡喜的，使得我最用心

我與《文匯報》的十年

去寫的，僅是香港《文匯報》，因為它成全了我自小的心願，我可以嗅着墨香，看自己的文章變成繁體的鉛字印在紙上。繁體漢字在中國文人眼中是厚重的，如同香港《文匯報》的人文色彩，也是一樣的濃郁、厚重。

除卻最初的「考驗」，我後來寫《文匯報》的專欄便一直是輕鬆的、自由的。我所寫《琴台客聚》的《采風》版編輯換了幾任，除了電郵交稿，我與之皆未謀面，但換來換去的編輯們從未變換過的，除了對稿子的文字，連標點符號都看得很認真，審得很仔細，讓我交上去的稿子出街後幾乎從無錯漏之外，就是從來不曾催過我交稿，有時候哪怕再過幾小時就要做版了，我還能很安心地坐在電腦前趕稿。我師父曾玩笑說，舊時一些文豪便如此，與我兩樣的是當時他們是持紙墨坐到報社辦公室趕稿，編輯們在一旁「立等可取」……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大抵也有此等景象，可見到了75年後的今天，編輯對作者的信任和包容依舊。

就像樹木生長需要好的土壤，一個寫作者遇到好的寫作平台亦是如魚得水。我在一期專欄裏提到粵語，講到母語的重要性，認為語言是精神的故鄉，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共鳴，以至於有次我和女兒從國外旅遊回來，在香港機場搭

的士到關口，途中與司機大佬「傾偈」，司機大佬說自己是香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竟一字不誤地講出了我那篇專欄的名字：《語言是精神的故鄉》，最後還堅決拒絕我和女兒給他車費。那一刻，我為自己得到讀者的認可而感動，亦感恩有香港《文匯報》這個紐帶，有了它厚重的承載，才有了那些讀者的認可。

到了2018年，我出版了《采風》和《琴台客聚》兩本隨筆集，其中大部分內容都選自我在《琴台客聚》的專欄文章。同年，我編劇的由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愛不可及》獲得了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故事片白金獎，同時在內地各大影院上映，在片中的感謝名單裏，我鄭重地寫上了香港《文匯報》，感謝它一路見證着我在寫作上的成長。

如今，在時代的潮流裹挾之下，紙媒日漸式微，刊載過我的文章的那些報刊雜誌，有的停刊了，有的被合併了，有的取消了副刊……我很慶幸，香港《文匯報》仍舊厚重地屹立在香江之畔，渺小的我，也還能夠以拙筆寫文來見證、祝賀她75歲的歷史。

但願下一個十年，再下一個十年……我依然能夠在報紙的淡淡墨香中，一一細述我與《文匯報》的每一段十年之緣。